

語言與社會期中作業

廖永賦

2018-05-29

1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在第一章中提到台灣國名的困境。請從你的觀點闡述國名的困境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解決。

坦白說，我並不認為目前有任何方法可以解決國名的困境。原因非常明顯，對岸是目前世界上拳頭最大的國家之一，對於臺灣的國名幾乎擁有絕對的否決權。黃宣範老師書中的討論似乎認為臺灣對於國名還有部份的自主權，然而我認為今日的情況並非如此樂觀，我們似乎只有在少數的非政府組織（規模還不能太大）才可能有國名的自主權。因此，縱使臺灣民眾對於國名有了共識，只要其不符中共的口味，此國名皆無法在國際上代表臺灣。

2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的書中第 16 頁的圖 3 提出了對於台灣語言位階圖的看法，請你回答下列問題。

(A) Diglossia

雙言結構最核心的概念是語言之間存在「位階」的關係。在許多雙語或多語的社會中，語言的使用與社會階級、社交場域有所關聯：特定的語言（通常只有一種）往往用於上層社會階級；正式場合，如新聞媒體、教育場所等；且通常有組織（如政府）對此語言進行規範，如規定標準讀音、文字化等。另一些語言則用於日常生活中，為家人、朋友之間溝通的語言，常常是語言使用者的母語。由於與特定的社會結構、場域以及政治力量結合，前述的第一種語言通常被認為「位階較高」，其它用於非正式場合的語言則被認為「位階較低」。雙言結構常出現於曾受殖民統治的地區，統治階級所屬的語言位於「高位階」而被統治的當地居民的語言則位於「低位階」，例如 12 至 15 世紀英格蘭當時的英語（低）與法語（高）、當代許多位於非洲、拉丁美洲曾被殖民的國家等。

(B)

- 媒體

臺灣的新聞媒體主要使用華語，然會於固定時段播出閩南語新聞（公視、民視、台視、

華視)。另外有特別設置客家電視台與原住民族電視台（原視）。

- 語言教育

臺灣的語言教育以華語為主，小學有鄉土語言的課程¹，同時也有英語課程。有趣的是，許多學生會用課餘時間補習英文。

- 公領域

公領域，如在學校、公司等，以使用華語為主。這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華語為臺灣目前最通行的語言。

整體而言，我認為很難從媒體語言、語言教育以及公領域的使用語言來說明圖 3 的語言位階。我認為這有很大一部份是因為時代的差距，今日的華語普及率已遠勝 25 年前，因此「語言教育」及「公領域的使用語言」皆以華語為主很難說是雙言結構的現象，因為今日許多家庭以華語為主，華語是臺灣許多人的第一語言。

另一方面，圖 3 將「臺灣國語」列為最低位階的語言。這點在今日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原因同樣也與華語普及有關。今日，「臺灣國語」應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應比較接近圖 3 中的臺灣國語，是母語非華語的人為了溝通需求而發展出帶有濃厚臺灣腔的華語，主要見於今日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們；另一種「臺灣國語」則見於今日大多數的臺灣人，是具有臺灣特色的華語，且為許多人年幼時即學會的語言，例如「ㄣ」、「ㄥ」不分，有些人「朋」讀作「ㄉㄨㄣˊ 2」。此第二種臺灣國語應為今日臺灣地區的主要語言，而其與閩南語、客家語之間似乎沒有存在明顯的位階關係（或許是我的偏見），例如，今日同學之間似乎不會發生誰笑誰講「某某語言」的現象。第一種臺灣國語在今日的印象中，似乎已融入方言：聽到這種口音代表眼前這位的母語是臺灣方言。

最後，關於圖 3 的洋化國語，我認為很難將其放入語言位階圖當中。洋化國語的出現是因為專業術語的需求，而專業術語可見於各行各業、用於圈內人。然我們並不會將含有專業術語的語言獨立成一套語言再將其置於語言位階圖中（例如，修車技師的術語不會被當作一套語言）。換句話說，我認為洋化國語並不能被當作「一種」語言，例如，醫生的肯定無法用洋化國語和物理學家進行溝通，因為「物理學家的洋化國語」和「醫生的洋化國語」是不相同的。洋化國語比較像是全球化帶來的現象，是在地語言的延伸，它和語族之間的統治與政治關係無關。

¹依臺北市的規定（“臺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補充規定,” n.d.），小學依學生意願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等三種本土語言。

3 在研究語言與社會的議題時，人口的結構非常重要，因為人口的多少與語言的權力有很大的關係。

(A) 從書中的討論，你認為黃宣範教授的推論合理嗎？有任何需要修正之處嗎？

黃宣範老師對於人口結構的推論幾乎著重在估計外省人口數。關於外省人口數的推論，我認為黃老師做足了功課，包含參考許多人口學者的估計，甚至也考慮到更改成外省籍的臺灣婦女。然而，比較另我困惑的是要如何處理通婚人口所生之子女？黃老師避過了此問題，而以獨立的方式處理人口結構：每個族群依照各自的族群成長率成長。當然，要處理通婚人口所生之子女會使事情變得非常複雜，因為需假定各族群的通婚情況。總體而言，我認為黃老師已在其能夠取得的資料下，做出最詳細的推論。

(B) 從本書出版到現在，已經過了 25 年，請用各種資料說明，台灣的人口結構與比例，以百分比呈現應該是多少？

根據內政部 1993 至 2017 的人口統計資料（人口總數、自然增加率）（內政部戶政司, n.d.），並假設

1. 各族群間自由通婚（假設通婚為隨機的）
2. 各族群自然增加率相同（依據內政部資料，每年自然增加率逐年下降）

則使用 1993 年內政部統計之總人口數 20995416 為起始，並以「閩南人：73.3%；外省人：13%；客家人：12%；原住民：1.7%」的比例計算出該年各族群人口做為開始。接著以內政部統計之每年自然增加率計算，可得 2017 人口比例如下表：

閩南	客家	外省	原住民
74.493%	12.195%	13.212%	0.091%

對照原委會資料（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2018 年 4 月原住民人數為 561,327，與這裡的 21213 有相當大的差距。這顯示原住民在保存自己文化上的動力比起預設（隨機通婚）還強上許多，或許是個值得高興的現象。

(c) 你認為台灣目前的平埔族完全消失了嗎？

平埔族因為生存於臺灣的平原地區，長久以來多數應以漢化，少部份的平埔族文化融入地方文化中。極少數的平埔族保存自己的文化，例如，宜蘭的噶瑪蘭族可能因為地域關係的緣故

而較能保有其文化。關於臺灣的平埔族是否完全消失，我認為其中一個很好的判定標準是其是否仍保有其族語。依此標準，「噶瑪蘭」、「巴則海²」、「噶哈巫」三個平埔族仍具有族語使用者（“平埔族群,” 2018），或許能作為臺灣平埔族尚未消失的證據之一。

4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第 53-73 頁中舉出了台灣過去歷史上的語言衝突事件。請找出讓你感觸最大的事件的兩至三件。說明為何這些衝突現象讓你特別有感觸

事件一（1988.10.9）：影片「舊情綿綿」因台語使用過多，片商無法爭取到普通級，只能以輔導級映演……新聞局怕他們（十三歲以下學童）會忘記國語，或拒絕使用國語。

此事件只是縱多類似事件的翻版：政府因為抱持著許多荒謬的信念，而做出許多滑稽可笑的規定。跳脫此事件，如果歷史上的政策規定，有這麼多是依據這些毫無根據的信念所制定，那真的對臺灣帶來很大的傷害。國語政策的背後，抱持著（國民政府心中的）漢文化是最「好」的、上下齊心（透過統一文化及語言）的國家是最強大的概念。結果就是造成臺灣多元的文化快速流失，逐步朝向單一化。臺灣是一個小國，不具備大國那種人海資源，因而小國的生存之道僅能仰賴創新。多元是創新的根本（Leung & Chiu, 2010; Leung, Maddux, Galinsky, & Chiu, 2008），逐漸失去多元性的臺灣如同在扼殺自己的生存空間。

事件二（1988.10.27）：僑選立委簡漢聲呼籲政府推展閩南語、客語、國語並進之雙語、三語教學，以使外省子弟能夠有學習本地方言的機會，使省級歧見消弭於無形……外省子弟更因沒有機會學習方言，而在就業等方面受到限制與歧視。

此事件讓我記憶特別深的原因是以我平常比較少接觸到的角度顯示國語政策帶來的影響。根據既往成見，總是會認為只有臺灣方言使用者是國語政策下的受害者，然而這裡以外省第二代的角度說明了國語政策的影響，外省子弟也是遭受歧視的一群人。這位僑選立委的發言，更隱含了一個非常有遠見的想法：消弭族群隔閡的方式並非只有將其同化成單一族群，讓每個族群互相學習可能會是種更好的方法。

²巴則海語目前沒有第一語言使用者。

5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書中的第 79 頁提到同化的 7 個步驟，並在第 80 頁提到，「台灣兩大族群之間同化（或融合）目前正處於（3）婚姻同化與（4）認同同化之間」。

我覺得到了我們這一代（1990 年後出生）應已達成階段 6「不再遭受歧視性的行為」的同化。其實對於臺灣的社會，從階段 4 過渡到階段 6 之間應該非常快速，這應與種族間的體質特徵（如膚色）差異程度有關。由於臺灣的各族群之間，外觀差異相當小，唯一能辨識族群差異的特徵大概只剩語言以及（相同語言下）發音的差異。當無法辨識出族群的差異，歧視性的態度或行為就沒有立基處，因而也就不會發生。

藉由觀察上一代的長輩們（40 歲以上），有時還能夠由漢語發音上的特徵推測其家庭的組成，但在我這一代中（20 歲左右）我已無法從發音中去區別族群。同時，相較我父母那輩會在意「誰是外省、誰是客家」，我們這代已不會談論這種事情。我們反而比較常（沒有惡意）自嘲或揶揄「誰是『天龍人』」。在我們這代沒有族群的區別³，只有「地域上（縣市）」的區別。

6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第 118-119 頁中有「日語運動與北京話運動比較表」，當然這個比較表是把比較重要的點提出來。

就時間軸上來說，我認為這份比較表算是完整。然而由於此比較表主要是以「事件」為主，造成一些重要的限制。我認為其未能夠突顯出「日語運動」與「北京話運動」之間的一項重要差異：對於本土語言造成的衝擊。

從今日的觀點來看，「北京話運動」要比「日語運動」成功太多。這一大部份的原因也根植於這兩種語言與臺灣本土語言（此以閩南語為主）的差異程度：「閩南語與北京話差異小，而與日語差異非常大」。這個本質性上的差異造成兩個國語運動有的一項重要差異：「日語運動（必須）透過閩南語教導臺灣人日語；北京話運動不需要透過閩南語，直接以漢語教學」。因為如此，日語運動並未以強烈的手段打壓閩南語，同時也保留漢文課且以閩南語教導古文、文言文。這進一步顯示出何以兩個「國語運動」會對本土語言帶來不同的衝擊：「透過閩南語教導文言文使其與『高雅』文化有直接關聯。與高知識份子之文化結合的閩南語，其語言位階將不會是今日的情況。今日的閩南語因為北京話運動而失去與『高雅』文化的連結，而僅能作為日常生活中的溝通語言，被排除在正式教育以及學術界⁴之外」。因此，閩南語被與

³這裡可能有個例外，是關於原住民的特殊身份。我認為這算是政府保障原住民的兩難。由於保障原住民的權益需標示出原住民的身份。有了原住民的標籤就有了差異的基礎，有了差異的基礎就有發生歧視的可能。在學校中，班上同學都會知道誰是原住民（通常不是因為特殊的口音或是可辨別的長相，總之就是會由其他同學那裡得知），有意識或無意識可能也會對其有不同的行為。縱使行為者本身不帶任何惡意，是否構成歧視，我認為還是需由當事人本身的感受進行評斷。我不是原住民所以我不能確定歧視是否發生。

⁴這裡並非獨尊「學術界」的重要性，而是指出臺灣人對於「學術界」或「知識份子」抱有較「好」或「上層」

較粗俗、低下的概念相連結，漢語則與高雅的文化相關聯。這加強了兩種語言之間的位階關係。

7

(A) 請想像，在台灣的歷史上，當原住民與荷蘭人第一次接觸時，他們如何溝通？

兩個語言無法互通的人第一次遇見之時要能溝通應是個漫長而緩慢的過程。要能溝通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兩者之間至少要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好險我們都是人類，在認知的結構上至少會有相似之處⁵。最明顯的共同結構即是 joint attention：嬰兒時期即可見於人類身上的特質，嬰兒會注意到周圍之人的注意力焦點，並且望向他人注目的方向。例如，嬰兒的視線常常跟隨著母親的視線。joint attention 也是「指涉」能在人類溝通時運作的基礎。原住民與荷蘭人第一次接觸時，最早的溝通應始於比手畫腳的「指涉」，接著透過有系統性地配對語音與「類似但有些微差異」的動作逐步累積詞彙，例如：

1. 拿著一片葉子並說出：「L」
2. 拿著一片葉子再使其落下，並說出：「LD」
3. 拿著一根樹枝並說出：「B」
4. 拿著一根樹枝再使其落下，並說出：「BD」

如此便可慢慢累積詞彙，雖然勢必會製造許多歧異，然至少應可做到最為簡略的溝通。

(B) 隨著時間的推進，原住民與荷蘭人的語言溝通如何進行？

透過上述緩慢的學習，任一方皆有可能學會另一方的語言。然而就歷史上的關係而言，原住民似乎沒有動機要學會荷蘭語，荷蘭人因為經濟利益的需求，較有可能具備動機學習原住民的語言。而歷史遺留下來的資料也支持這個想法。荷屬東印度公司在臺灣三十多年，透過傳教士傳入基督教以及書寫系統。傳教士為方便傳教與傳達政令，學習原住民語言並且編撰字典將新港語透過羅馬拼音文字化。文字化後的新港文更為日後西拉雅族用於契約簽訂，形成了新港文書（「新港文書」2018, 2018）。

感覺的現象。這原因或許根植於臺灣長期受到漢人文化的影響。

⁵有關 Bonus 題的題外話：或許人類根本不可能與 heptapods 成功溝通。Dr. Banks 與 heptapods 之間的溝通始於「指涉」（Banks 指向自己並寫著 Louise），然而外星人要理解這個動作的意義必須先有「指涉」的概念，且其注意力運作的方式需與人類類似（當 Banks 指向自己時，heptapods 需要知道必須將注意力放在 Banks 「手」指之處而非「手肘關節」指向之處）。

8 請選擇下列至少兩部電影，闡述電影中語言的使用現象為何？並說明電影中的語言使用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嗎？

幸福路上

《幸福路上》以閩南語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語言，我覺得相當符合當時社會的情況。電影中的地點設定為臺北，臺北作為一個移居者匯集的地區，生活中的語言使用應以當時最流通的語言為主（溝通指數最高），而閩南語應為當時民間最流通的語言。

電影中另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即為主角小琪的語言。《幸福路上》以小琪的故事作為主幹，而小琪的故事其實就是《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自身的成長故事（“宋欣穎,” 2018, 2018, 2018, 2018）。根據導演的受訪，馬上就可以回答電影中這個「奇怪」的語言現象—為何生長在父母皆使用閩南語的家庭，小琪仍然較常使用中文（漢語）？電影忠實地呈現了導演宋欣穎自身語言使用的情況：

我的外婆是個有原住民血統、吃檳榔的外婆，可是我家裡都講台語，而事實上我自己又不太會講（台語）。等我到了美國，看到他們的移民家庭裡，父母都使用母語，除了中文還有西班牙語、和甚至非洲語等等，可是小孩都用英文回答他們，我覺得這很有趣，怎麼會跟我們家一樣？（“釀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與其一直抱怨這個環境，為什麼不想辦法改變它？」,” 2018）

小琪的現象或許並非罕見。例如，研究顯示通常同儕相對於父母對使用何種語言有較大的影響力（Stanford, 2008），或許在當時的國語政策下，同儕間（在學校）的溝通語言變成漢語為主，造成小琪日後以漢語作為主要語言。另一可能的原因為性別。以我所知的例子，1. 我外公為外省籍的老兵，不會講閩南語，但其常不在家。我外婆為本省籍，講閩南語⁶。因此可合理推測我母親幼時，家庭應該以閩南語為主。然我母親雖會講閩南語，但不算是最流利的那種（少了點母語使用者那種流暢的口音，某些詞彙也不清楚）。2. 這學期我聽中文系的張麗麗老師提及她自身的狀況：與我母親相同，老師也是在外省（父）—本省閩南（母）家庭長大的。老師說她以及妹妹不會閩南語，但她的兄弟皆會流利的閩南語。

9 你覺得語言結構會如何影響思維？

語言與思維的關係相當複雜。縱使最極端版本的 Sapir-Whorf Hypothesis—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被認為是錯誤的，語言仍有可能以其他更細微的方式影響思維。

⁶有趣的是，我外婆跟我（還有跟我目前8歲的表弟）說話時，會自動改成使用漢語。而我小時候在外婆家住過一段時間，那時正好是我開始學會講話的時間。不知道這是否與我低落的閩南語程度有關。

依據思維相對於語言運作的時機，可將之區分為「說話前的思考（Thinking for speaking）」、「運用語言思考（Thinking with language）」、「語言對思考的後續影響（Thinking after language）」（Wolff & Holmes, 2010）。以下簡單各舉一例：

1. 說話前的思考：有些語將動作的方式（manner）表示於動詞，而將動作的方向（path）表示於其它詞類（如副詞），英語、中文即為這種語言（「run out」、「跑出去」）。另一些語言比較重視動作的方向（path）而將其用於動詞，將動作的方式（manner）表示於其它詞類，如法語、日語、希臘語。這些不同語言上的結構差異，造成其使用者開始說話前，注意力關注的焦點不同。例如，希臘語使用者比起英語使用者更傾向注意動作的方向（path）（Papafragou, Hulbert, & Trueswell, 2008）。
2. 運用語言的思考：運用語言的思考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對於「精確」數量的概念。人類以及許多其他動物，天生就對極小的數量（小於 3 或 4）的數量有絕對的概念、對大量的數量有約略的概念。但對精確的「數字」，如「33」，卻只有人類能透過後天習得。明確的證據指出精確的數字概念與語言之間的關聯（Dehaene, Spelke, Pinel, Stanescu, & Tsivkin, 1999; Frank, Everett, Fedorenko, & Gibson, 2008; E. S. Spelke & Tsivkin, 2001）。沒有語言，或語言中不具有數字系統，人類將無法以精確的數量進行思考。
3. 語言對思考的後續影響：前述兩種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係直接與語言有所關聯，即思考本身是為了表達，或是透過語言進行思考，語言似乎直接參與了思考歷程。「語言對思考的後續影響」指的則是不涉及語言本身的思考：在長期使用特定語言下，是否會對思維產生影響。其中一項支持的證據來自語言中是否具備單複數型態。日語、中文等語言的名詞，沒有單數或複數型態的差別；英語則必須指出名詞為單數或複數。因此，英語使用者可能會傾向將注意力集中在「個體」的特質，而日語或中文的使用者則可能傾向將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特質。例如，英語使用者可能較注意椅子的形狀，而日語、中文使用者則較注意椅子的材質。此假設受到 Li, Dunham, & Carey（2009）的研究支持。

這些研究證據顯示語言以不同種方式影響思維的可能。然關於 Daniel Everett 對於 Pirahã 人的想法：「他們的語言沒有時態，他們真正活在當下之中」，似乎隱含更複雜的因素。首先，我同意這句話的後半段：人類在進入大規模社會後，先是曆法、接著時鐘的發明似乎改變人類對於時間的概念，大家開始擔心時間的流逝，並且開始「預約未來」（排行事曆、約會時間等）。Pirahã 人生活在沒有現代時間概念的社會中，且其生活方式也無須擔心是否有事情未完成，因此其「活在當下」顯得相當合理。然我認為難以使用「他們的語言沒有時態」作為理由。從 Pirahã 人的文化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其許多部份皆支持著 Pirahã 人「活在當下」，例如簡單的物質技術（所以不須從事大規模的生產）、從事漁獵採集（所以比起農耕更加不勞力密集）、沒有強烈的物質需求（只向 Everett 要求一些簡單的物資）等。文化本身即是強而有力

的解釋，能夠說明 Pirahã 人「活在當下」。忽略這些文化因素而單以語言的結構作為解釋顯得相當不合理，而這也正是為何沃爾夫被認為是錯誤的原因：「他太過強調語言對思維的影響，認為語言的影響甚至強過外在環境的影響——外在環境無法決定能否分辨顏色，但語言中的顏色字卻可以」。

Bonus

電影中不只一次出現語言與意圖的關係——詞彙不只帶有字面上的意義，隨著使用者的不同意圖或是既存的偏見，造成字彙有不同的詮釋意義。例如，電影開始不久後，Colonel Weber 兩度拜訪 Dr. Banks 時，Banks 提及梵語 (Sanskrit) 「戰爭 (war)」的詞彙以及意義：

(Colonel 從學校離開前的對話)

Louise: Are you going to ask Danvers next?...Before you commit to him, ask him the Sanskrit word for war and its translation.

(Colonel 半夜搭直昇機拜訪 Dr. Banks)

Colonel: He says it means “an argument”. What do you say it means?

Louise: A desire for more cows.

我認為這裡展現出電影對於語言的多義性的重視，以及其對於人類的影響。對相同詞彙的不同翻譯，展現出非常不一樣的意圖：一個表現出「敵意」(“argument”)，另一個則相對和平 (“desire for more cows”)——在一念之間，不同的詮釋可能造成衝突或和平。

語言與意圖之間的關聯在電影中的另一個地方更加地被突顯了出來：

(Dr. Banks 在翻譯擷取的中文)

Louise: Colonel, those are all tile sets in mah-jongg. Are they using a game to converse with their heptapods?

Colonel: Maybe. Why?

Louise: Well, let's say that I taught them chess instead of English. Every conversation would be a game. Every idea expressed through opposition, victory, defeat.

Louise: You see the problem?

Louise: If all I ever gave you was a hammer...

Colonel: Everything's a nail.

這裡更加入了語言的「譬喻」特性，透過譬喻語言的意義得到了驚人的擴充。「譬喻」在這裡或許也顯示出人類喜好尋找語言的「言外之意」的特性，也顯示溝通過程中從來不是簡單的

「送出」與「接收」，而是在過程中相互不斷進行揣摩與推論。語言與溝通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

電影中的其它部份，主要闡述人類的思考如何受限於我們生存的世界、概念以及語言。電影中代有非常強烈的沃爾夫的色彩，認為學習一種結構非常特異的語言能為大腦帶來全面性的改變，甚至超越我們所生存的三度空間，感知超越「現在」的時空。我想這邊屬於電影比較浪漫、自由創造的部份，也同時是這部電影中最吸引人的地方，縱使我多半不認同這些主張。

參考資料

- Dehaene, S., Spelke, E., Pinel, P., Stanescu, R., & Tsivkin, S. (1999). Sources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Behavioral and Brain-Imaging Evidence. *Science*, 284(5416), 97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84.5416.970>
- Diglossia. (2018). *Wikipedia*.
- Frank, M. C., Everett, D. L., Fedorenko, E., & Gibson, E. (2008). Number as a cognitive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Pirahã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108(3), 819–824.
- Leung, A. K.-y., & Chiu, C.-y. (2010).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Idea Receptiveness, and Creativi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1(5-6), 723–741.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10361707>
- Leung, A. K.-y., Maddux, W. W., Galinsky, A. D., & Chiu, C.-y. (2008).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enhances creativity: The when and how.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3), 169–181.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63.3.169>
- Li, P., Dunham, Y., & Carey, S. (2009). Of Substanc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Effects on Entity Construal. *Cognitive Psychology*, 58(4), 487–524. <https://doi.org/10.1016/j.cogpsych.2008.12.001>
- Papafragou, A., Hulbert, J., & Trueswell, J. (2008). Does language guide event perception?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Cognition*, 108(1), 155–184.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08.02.007>
- Spelke, E. S., & Tsivkin, S. (2001). Language and number: A bilingual training study. *Cognition*, 78(1), 45–88. [https://doi.org/10.1016/S0010-0277\(00\)00108-6](https://doi.org/10.1016/S0010-0277(00)00108-6)
- Stanford, J. N. (2008). Child dialect acquisi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parent/peer influence1.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5), 567–59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841.2008.00383.x>

Wolff, P., & Holmes, K. J. (2010). Linguistic relativity.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2(3), 253–265. <https://doi.org/10.1002/wcs.104>

內政部戶政司. (n.d.). 人口統計資料. text/html, <https://www.ris.gov.tw/tr/346>.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 原住民族委員會. 新聞,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2D9680BFECBE80B609A13BC98>

宋欣穎. (2018). 維基百科.

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上）：力爭上游了，然後呢？－上報 / 生活. (2018, January).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9595.

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下）：我們應該共同記得一些事情－上報 / 生活. (2018, January).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2864.

平埔族群. (2018). 維基百科.

新港文書. (2018). 維基百科.

新港語. (2018). 維基百科.

臺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補充規定. (n.d.).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10050051003200-1021022>.

釀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與其一直抱怨這個環境，為什麼不想辦法改變它？」. (2018, January). <http://sosreader.com/n/article/5a8ea24deceaedde8df7dcc4>.